

# 宋人不言慶曆“新政” “新法”“變法”考

## ——基於觀念史的個案研究\*

馮志弘

### 提 要

宋人雖常以“新法”“變法”“新政”賅括熙豐政事，但未曾以這些詞彙歸納慶曆之政；當代文史著作常言“慶曆新政”，這說法卻不見於清代以前文獻，原因何在？本文考析宋人慶曆書寫，指出：(1) 熙豐變法時期宋人從未直接比較范、王改革主張，也不曾認為慶曆、熙寧更革是可比的對象，這些聯繫待朱熹而後始。今人或曰熙豐變法之時，慶曆革新派趨於保守，這固屬當代觀點，卻非宋人認識；(2) 范仲淹故後，對其顯有貶評者只有梅堯臣、宋神宗、王安石三例，後二者對范的批評，反映熙豐變法主事者並不完全認同慶曆改革；(3) 歐陽修等慶曆當事人認為范仲淹改革失敗皆因“群言營營，卒壞於成”，可是徽宗朝以後卻出現“慶曆之治”說法，其內涵又被簡化為仁宗能“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這說法無法揭示慶曆之政真正特色，又故意忽略慶曆改革主事者因“衆訾成波，擠落在外”的事實，卻有利於范仲淹作為忠義第一人形象的建立；(4) 宋人從不曾認為慶曆之政有違祖宗之法，這是宋人不言慶曆“新政”的根本原因。南宋以後論者以范仲淹為“守我宋之家法者”，進一步確立這觀點。

**關鍵詞：**范仲淹 慶曆新政 熙寧變法 王安石 觀念史

---

\* 本文為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全額資助項目：“典範與世變：慶曆至熙豐年間的頌詩、誥令和禮書——以北宋詩文革新人物為中心”（項目編號：18603320）階段研究成果。蒙《人文中國學報》兩位匿名評審專家賜教，謹此致謝。

## 一、前言

當代文史學者常言“慶曆新政”，以之賅括慶曆三年(1043)九月至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989—1052)主導之更革，並與熙寧變法相比較<sup>1</sup>——這是今人的認識。但本文考證宋人從不說慶曆(或范仲淹)新政/新法/變法；“范仲淹變法”之說首見於明代，“慶曆新政”概念之使用不及一百年。問題包括：

- (1) 今存宋代文獻中，“熙寧新法”“王安石變法”等概念俯拾皆是，亦偶見“熙寧新政”說，則宋代語彙並非無“新政”等用語；那麼，宋人不言慶曆新政的現象，反映了宋代與後世對慶曆政事之認識的何種差異？
- (2) 熙、豐變法至元祐更張時期宋人，包括慶曆當事人富弼(1004—1083)、歐陽修(1007—1072)、韓琦(1008—1075)對王安石(1021—1086)變法多有貶評，卻從未直接比較范、王新政之異同，原因何在？宋神宗及王安石對慶曆新政及范仲淹之評價究竟如何？
- (3) 慶曆改革主事者幾乎一致認為慶曆之政因“群言營營，卒壞于成”，<sup>2</sup>可是徽宗朝以後卻出現“慶曆之治”說；<sup>3</sup>然則未竟全功的“新政”，如何一變而為“治世”之楷模？由此塑造了慶曆以後宋人筆下范仲淹的何種形象？

1 如范文瀾認為王安石實踐並發展了范、歐的主張，見氏著：《中國通史簡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上海聯合發行所，1949年)，頁378；余英時認為慶曆與熙寧變法始於仁宗時回向三代運動，見氏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上編，頁269。

2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21，頁336。

3 陳師錫：《上徽宗論任賢去邪在于果斷奏》：“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至慶曆、嘉祐之治。”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17，頁160。曹家齊指出宋人或兼論“慶曆、嘉祐之治”或“至和、嘉祐之治”，但認為宋人將嘉祐與慶曆並稱主要就用人而言；就政局言之則慶曆最是動蕩，遠不能與嘉祐相比。曹家齊：《“嘉祐之治”問題探論》，《學術月刊》2004年第9期，頁62—63。

本文針對上述問題，通過詞彙及觀念史視角，<sup>4</sup>回到歷史現場，以了解宋人——尤其是慶曆至熙寧、元祐時人對慶曆之政的認識；這切入點也有助回答當代論者提出：何以熙寧變法時期，慶曆革新派趨於保守的問題。

## 二、幾個關鍵詞：“新政”“新法”“變法”“更張”

北宋時人對本文論題所涉詞彙之用法，與當代學界有何異同？《全宋文》、《全宋筆記》、中國基本古籍庫等完全找不到“慶曆（或范仲淹／文正／文正公）新政（或新法／更革／更變）”之例，“范仲淹變法”說首見於明·鄒智（1466—1491），曰：“范仲淹變法於慶曆，百世以爲宜；王安石變法於熙寧，百世以爲病”，<sup>5</sup>此說不認爲“變法”必不可取，其宜病，端視主事者之別；惟鄒智文章未提及范、王變法具體內涵。“古籍庫”中“范仲淹變法”只此1例，反映宋代以後直至清朝，極少採用這概念。1940年錢穆《國史大綱》第32章爲“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慶曆熙寧之變法”，是共和國成立前採“慶曆變法”概念最權威著作；<sup>6</sup>蒙文通寫於1954—1958年間的《北宋變法論稿》稍提及“慶曆改革”，該文主要討論熙寧變法，未云“慶曆變法”。<sup>7</sup>臺、港及歐、美華裔學者受錢穆影響，如余英時沿襲師說，亦曰慶曆變法、范仲淹變法。<sup>8</sup>使用“慶曆變法”的當代大陸學者如霍松林，<sup>9</sup>香港學者馮志弘兼用慶曆新政、慶曆變法。<sup>10</sup>

4 關於觀念、思想、哲學概念之別參馮志弘：《導論》，《想象的世界：唐宋觀念與思想》（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1—9。

5 鄒智：《書江西陳大參贈其從子詩後》，《立齋遺文》（明天啓刻本），卷2，頁25。

6 錢穆：《國史大綱》（上海：國立編譯館，1940年），頁396—413。

7 蒙文通：《北宋變法論稿》，見氏著：《古史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頁457。

8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編，頁264、266；劉子健：《梅堯臣〈碧雲騷〉與慶曆政爭中的士風》，見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104。

9 霍松林編選：《歷代好詩詮評》，霍松林編選：《霍松林選集》（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冊10，頁375。

10 馮志弘：《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2、78。

筆者找到較早使用“慶曆新政”概念者為高欣(1959年)、<sup>11</sup>翦伯贊(1963年),<sup>12</sup>距今僅60多年,雖然如此,20世紀60年代後以“新政”一詞賅括慶曆政事,幾成內地學者共識;內地使用“慶曆新政”語例的數量,也壓倒性多於“慶曆變法”,<sup>13</sup>並影響日本學界。<sup>14</sup>英語漢學著作,以劉子健為代表,多用“Reform”描述范仲淹主導的慶曆之政,“Reform”一詞同樣用來描述王安石變法或熙豐變法;<sup>15</sup>即就英文而言,慶曆、熙豐之改革並無中文“新政”(New Policies)和“變法”(Reform)的語義之別。一言蔽之,“慶曆新政”雖是內地學者習以為常說法,但不見於清代之前文獻,亦非宋人提出的概念。

那麼,慶曆改革主事者如何理解及使用本文論題詞彙?今本范仲淹全集未見“新政”“新法”用語,云“變法”者只1例,即引李士衡(959—1032)語:“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此指“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sup>16</sup>事,引句中的“變法”指個別政策之變,即“變法”一詞在范仲淹筆下不一定指大規模改革。前引1959年高欣文章已指出,范仲淹多次引《周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作為變革根據,<sup>17</sup>但須留意范說的是“變通之道”,而非“變法”,故其

11 高欣:《北宋變法的開端——慶曆新政》,《史學月刊》1959年第5期,頁14—17。

12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冊中,頁40。

13 檢索主要收錄大陸著作的讀秀學術搜索平臺:“慶曆變法”凡170例,“慶曆新政”凡13465例;後者是前者的79.21倍。2022年12月4日訪問。

14 熊本崇,國方久史均兼用“慶曆新政”及“慶曆改革”,熊本崇:《宋仁宗立太子前後——慶曆“改革”前史》,《集刊東洋學》1998年第79期,頁44;國方久史:《范仲淹の慶曆改革について》,《吉備國際大學社會學部研究紀要》2001年第11期,頁68。

15 James T. C. 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5.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66, 213. Paul Jakov Smith, “A Crisis in the Literati State: The Sino-Tangut War and the Qingli-era Reforms of Fan Zhongyan, 1040–1045”,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5 (2015), pp. 59–137.

16 范仲淹:《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卷13,頁265。

17 高欣:《北宋變法的開端——慶曆新政》,《史學月刊》1959年第5期,頁16。“窮則變”引句見范仲淹:《奏上時務書》(天聖三年1025年)、《上執政書》(天聖五年1027年)、《答手詔條陳十事》(慶曆三年1043年),分見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卷9,頁170;卷9,180;《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頁461。

《十事疏》緊接《易經》引句後云：“此言天下之理有所窮塞，則思‘變通之道’。既能變通，則成長久之業。”<sup>18</sup>“變通”的目的是暢順窮塞之理，使之復通，即復於天下之常理、常道。此外范仲淹更多以“更張”指涉慶曆之政，如“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sup>19</sup>“綱紀制度，日削月侵……不可不更張以救之”；<sup>20</sup>在其《遺表》中寫的仍是“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sup>21</sup>何謂“更張”？《漢書·禮樂志》：“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sup>22</sup>這段話以正琴瑟不調之音，必須改變現狀（解→更張之），方可恢復琴瑟原來諧協的音色（不調→可鼓），比喻更化政事之道，即“更張”以復常、復正為目的。

歐陽修亦以“更張”指涉慶曆之政，其《外制集序》（1045）云“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余）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sup>23</sup>歐陽修筆下“更張”“變法”之語意孰褒孰貶，端視前文後理而定，如《胡宿墓誌銘》（1067）記嘉祐年間群臣“多更張庶事以革弊”，胡宿（995 或 996—1067）曰：“變法，古人之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sup>24</sup>歐陽修以為胡宿能“顧惜大體”，即以“多更張”為矯枉過正，失大體。《論逐路取人劄子》（1064）引《尚書·蔡仲之命》“無作聰明亂舊章”及《商君書》杜摯（秦孝公時人）“利不百者不變法”之言，否定逐路取士。<sup>25</sup>但歐陽修筆下“變法”不一定是貶義，如慶曆四年（1044）《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歐“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sup>26</sup>總之，范、歐言“更張”“變法”，或指革弊復常，或指變改個別政策，但未曾稱慶曆政事或政策為“新政”，更從沒指出慶曆改革政策有何“創新”。

18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頁 461。

19 范仲淹：《上執政書》，同上，卷 9，頁 181。

20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同上，頁 461—462。

21 范仲淹：《遺表》，同上，卷 18，頁 374。

22 班固：《漢書·禮樂志》（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卷 22，頁 1032。

23 歐陽修：《外制集序》，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 41，頁 596。

24 歐陽修：《贈太子太傅胡公墓誌銘》，同上，卷 35，頁 517。

25 歐陽修：《論逐路取人劄子》，同上，卷 113，頁 1716。

26 歐陽修：《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同上，卷 104，頁 1590。

“新法”一詞見歐陽修《論茶法奏》(1060)曰:“茶之新法既行……舊納茶稅,今變租錢”,歐以爲“茶之新法”得利者一,而爲害者五,故宜“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sup>27</sup>——此句以新法作爲祖宗舊制的對立面。歐集中“新政”一詞凡二例,均見於治平四年(1067)神宗登極之時,云“當萬機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四海共忻於新政”,<sup>28</sup>這2例的“新政”與政策更張變改無關,則此處的“新政”並不意味有違祖宗之法,而可視爲新帝即位,或年號更迭後之政事。

總之,和范仲淹一樣,歐陽修認爲慶曆之政爲“更張”,未曾以新政、新法、變法指向慶曆改革。當歐陽修使用“新法”一詞表示改變祖宗法度時,顯具貶義;當“新政”表示新帝即位,未涉政制政策改變,可屬褒義。由於慶曆時既非天子即位,歐陽修亦不認爲慶曆更張從根本性改革祖宗法度——這是他不以“新政”二字描述慶曆變革的主因。

皇祐二年(1050),章望之(大中祥符五年1012進士)云“慶曆癸未(1043)甲申,用事之臣改革百度”,<sup>29</sup>首以“改革”二字歸納范仲淹主導的慶曆之政。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卒,富弼謂其在慶曆之時“別上法度之說甚多”,<sup>30</sup>蘇頌(1020—1101)謂其“修明百度,更張四維”,<sup>31</sup>熙寧六年(1073)吳充(1031—1080)《歐陽修行狀》謂慶曆之政“多所更革”;<sup>32</sup>配合慶曆當事人范、歐用語,反映北宋中葉時人視慶曆之政爲更革、更張,偶爾稱慶曆個別政策爲變法,但不云慶曆之政爲新政、新法。

27 歐陽修:《論茶法奏》,同上,卷112,頁1701—1702。

28 歐陽修:《辭覃恩轉左丞表》《乞罷政事第三表》,同上,卷92,頁1369;卷93,頁1373。

29 章望之:《州學記》,林表民:《赤誠集》(明弘治十年謝鐸刻本),卷5,頁5。

30 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杜大珪編:《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明遞修本),中集卷12,頁4。

31 蘇頌:《代杜丞相祭范資政》,蘇頌著,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70,頁1062。

32 吳充:《歐陽公行狀》,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附錄》,卷3,頁2694。

宋神宗《言財利可採錄施行者甄賞詔》(熙寧二年 1069)亦以“更張”指涉熙寧理財之法,<sup>33</sup>同年侍御史劉琦等諫曰:“先朝所立制度,乃陛下家法……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良可惜也。”<sup>34</sup>這是以“更張”作貶義詞,以批評熙寧改革的罕見例子。惟神宗朝時人——尤其是反對改革者——更多以“新法”“變法”指稱王安石主導的熙寧之政。如熙寧三年(1070)劉放(1023—1089)引“商鞅爲秦變法,其後夷滅。張湯爲漢變法,後亦自殺”故事,批評王安石變法不得人心,恐不得善終(“未有保終吉者”);<sup>35</sup>同年孫覺(1028—1090)稱青苗法爲“新法”。<sup>36</sup>熙寧四年(1071),楊繪(1027—1088)主張兼聽支持及反對變法之言,並“聽難于變法者,俾慮其終之害而防之”;<sup>37</sup>同年蘇軾(1037—1101)《上神宗皇帝書》云“臣非敢歷詆新政”——一篇中“新政”一詞非如歐陽修泛指神宗登極之政,而是專指“制置三司條例”有違“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sup>38</sup>等的政策。《涑水記聞》載熙寧六年(1073)神宗嘗云:“聞民間亦頗苦新法”,<sup>39</sup>若司馬光(1019—1186)記載神宗原話無誤,則神宗本人亦以“新法”二字賅括熙寧之政。此後如熙寧七年(1074)詔:“聞淮南路推行新法,多有背戾”,<sup>40</sup>元豐八年(1085)呂公著(1018—1089)批評王安石“變易舊法”;<sup>41</sup>哲宗繼位,司馬光云王安石“變亂舊章”,請哲宗“悉更張”之;<sup>42</sup>元祐元年(1086)畢

33 宋神宗:《言財利可採錄施行者甄賞詔》,佚名編:《宋朝大詔令集》,卷 184,《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冊 456,頁 590。

34 劉琦等:《上神宗論王安石專權謀利及引薛向領均輸非便》,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 109,頁 1188。

35 劉放:《與王介甫書》,《彭城集》,卷 2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冊 1096,頁 272—273。

36 孫覺:《上神宗論條例司畫一申明青苗事》,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 112,頁 1225。

37 楊繪:《上神宗論舊臣多求退》,同上,卷 74,頁 808。

38 蘇軾:《上神宗皇帝書》,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 25,頁 730、741。

39 司馬光,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卷 16,頁 314。

40 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252,頁 6179。

41 呂公著:《上哲宗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 117,頁 1285。

42 司馬光:《請更張新法札子》,司馬光著,李文澤、霞紹暉校點:《司馬光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 年),卷 47,頁 1007。

仲游(1047—1121)謂“新法之行,幾二十年矣”。<sup>43</sup> 大觀元年(1107)《宗室俸錢御筆》云“熙寧變法,皆循中制;而元祐紛更,務從裁削,失敦宗之道”<sup>44</sup>——篇中肯定熙寧變法合於中道,意味元祐諸臣雖猛烈批評“變法”,卻無妨徽宗朝文誥以熙寧變法——廣義來說,以“變法”為可歌頌之事。和“變法”在元祐以後不一定是貶義一樣,“更張”也不一定是褒義,如朱熹(1130—1200)說“元祐諸賢……蓋矯熙、豐更張之失”,<sup>45</sup>這裏的“熙豐更張”顯為朱熹所否定。

總之,“更張”“變法”概念均為慶曆、熙豐當事人用語,其褒貶義非不辨自明,須視語境而定。學界已指出在北宋語境下,反對王安石變法者以為其所變之法是祖宗之法,反對元祐變法者則以為其所變之法是神宗之法;<sup>46</sup>這切合熙豐至元祐時人認識,但無法概括慶曆之政當事人對“變法”觀念的理解。通過分析范、歐使用本文論題關鍵詞的全部用例可見,范、歐以“更張”二字描述慶曆之政,是因他們視“更張”為手段,更張的原因是“天下之理有所窮塞”,更張的目的是革弊復常,使“綱紀再振”。<sup>47</sup>

有別於今存文獻宋人未曾指慶曆改革為“新法”,以及不以慶曆之政有違祖宗法度;<sup>48</sup>熙豐政策反對者多以“新法”為“祖宗之法”的對立面,如元祐八年(1093)范祖禹(1041—1098)云“先太皇太后……罷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sup>49</sup>致使“新法”一詞在元祐以後常含貶義。當然元祐之時不可批評先帝(神宗)太甚,故蘇轍(1039—1112)否定熙豐新法時說:“先帝晚

43 畢仲游:《上門下侍郎司馬溫公書》,《西臺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7,頁92。

44 宋徽宗:《宗室俸錢御筆》,佚名編:《宋朝大詔令集》,卷178,《續修四庫全書》,冊456,頁573。

45 朱熹:《朱子語類》,卷130,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冊18,頁4045。

46 參張呈忠:《變法·更化·變質——試論北宋晚期歷史敘事三部曲的形成》,《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5期,頁53。該文尚未討論慶曆改革及與之相關的更張、新政等用語。

47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頁461—462。

48 曹家齊調慶曆政事主政及反對者均未就“祖宗家法”正面展開衝突,《趙宋當朝盛世說之造就及其影響——宋朝“祖宗家法”與“嘉祐之治”新論》,《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4期,頁74。

49 范祖禹:《聽政劄子·第二劄子》,《范太史集》,卷2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冊1100,頁298。



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sup>50</sup>即認為神宗晚年已覺今是昨非，有意撥亂反正，以此作為元祐更張的理據。反之，紹聖年間批評司馬光者，則以神宗之政為祖宗家法，故言“（司馬）光唱（蔡）京和，首變先帝之法”。<sup>51</sup>受蘇軾等慣以“新法”“新政”指向熙豐變法的影響，元祐以後“新政”一詞若作褒義用，常須論證其如何符合祖宗之法，如建中靖國元年（1101）鄧忠臣（熙寧三年 1070 進士）謂范仲淹之子范純仁（1027—1101）“適訪落之初年，講圖舊之新政”——<sup>52</sup>藉此強調元祐“新政”的目的是“圖舊”，即復祖宗家法。這種“如何詮釋新政使之符合祖宗家法”的話題，從不見於慶曆之政時人的論述，反映北宋時人以爲慶曆之政與熙豐政事，性質有別，前者從沒被視為有違祖宗之法的“新政”。

### 三、“慶曆新政”失敗，或“慶曆之治”？

“慶曆新政”與“慶曆之治”兩種說法十分弔詭——前者結果未竟全功，<sup>53</sup>後者卻指向仁宗盛世；則范仲淹改革失敗，何以竟成慶曆致治之由？

當代學者如漆俠、方健均以范仲淹《十事疏》為“新政”的綱領，標誌其開始，<sup>54</sup>此認識和范、歐等論“慶曆更張”的內涵大同小異，惟後者更強調慶曆改革之於揚善去惡、經國濟世的意義，如富弼云：“（范）以十策上之……又先特別上法度之說甚多，皆所以抑邪佞，振綱紀，扶道經世”，<sup>55</sup>或用《十事疏》原話，即

50 蘇轍：《穎濱遺老傳上》，蘇轍著，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樂城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12，頁1017。

51 董敦逸：《劾蔡京附司馬光變易神宗之法奏》，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367，頁8836。

52 鄧忠臣：《范忠宣公謚議》，呂祖謙詮次：《皇朝文鑑》（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麻沙劉將仕宅刻本），卷135，頁103。

53 朱瑞熙指出慶曆新政部分政策延續至慶曆五年後，《范仲淹“慶曆新政”行廢考實》，《學術月刊》1990年第2期，頁50—55。

54 漆俠：《范仲淹集團與慶曆新政——讀歐陽修〈朋黨論〉書後》，《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頁133。方健：《前言》，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頁10。

55 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杜大珪編：《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集卷12，頁4。

“更張以救之……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sup>56</sup> 這種申明慶曆之政端本澄源、扶道經世的評價，復被高度概括為“修明百度，更張四維”<sup>57</sup>八字。《十事疏》全文逾 6 400 字，“新”字凡 4 例，無一指向政制法令之“創新”。<sup>58</sup> 皇祐四年，歐陽修撰范仲淹神道碑，歸納慶曆改革內涵為“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在逾 2 000 字的碑文中，“新”字只有“新失大將”1 例，<sup>59</sup>與慶曆改革無關；富弼撰范仲淹墓誌銘逾 3 600 字，“新”字 2 例為“王師新敗”及“斂無新衣”；<sup>60</sup>《宋史·范仲淹傳》逾 4 000 字，“新”字 2 例為“新莽”及“新羅大寇”。<sup>61</sup> 總之，范、富、歐、《宋史》釋論慶曆之政內涵——甚至綜述范仲淹一生功業時，雖羅列了慶曆期間政策之更變，但均未曾提及慶曆政事為“新政”，也未云范仲淹政策為“革新”。

宋人(尤其是熙寧、元豐、元祐時人)固有指斥王安石任用小人，同時也討論熙豐政策具體之失，特別是青苗、保甲、免役、市易、茶鹽之法之弊。<sup>62</sup> 與此不同，今存文獻無論是慶曆改革主事或反對者，均罕言慶曆更張具體政策有何錯失。他們互相指斥對方是朋黨與小人，即以儒家傳統的“君子—小人”之論(道德原則)，作為判斷慶曆更革的是非對錯。

56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頁 462。

57 蘇頌：《代杜丞相祭范資政》，蘇頌著，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卷 70，頁 1062。

58 4 例為“新及第人”、“付新授知州”、“新招者”、“新舊循環，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頁 468、471—473。

59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 21，頁 334。

60 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杜大珪編：《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集卷 12，頁 5。

61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314，頁 10267、10275。

62 如熙寧三年（1070）歐陽修：《言青苗錢第一劄子》，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 114，頁 1730—1732；熙寧九年（1076）蘇轍：《自齊州回論時事書》，蘇轍著，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樂城集》，卷 35，頁 616—618；元豐八年（1085）呂公著：《上哲宗論更張新法當須有術》，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 117，頁 1285。

景祐三年(1036),高若訥(997—1055)謂范仲淹“自結朋黨,妄自薦引”,<sup>63</sup>同年仁宗《責范仲淹敕榜朝堂》論范仲淹“行己之道,挾私立黨者必懲”,<sup>64</sup>這是慶曆四、五年間“朋黨”論爭的伏線,如慶曆四年藍元震(?—1077)謂范等“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sup>65</sup>翌年錢明逸(1015—1071)首劾范、富,謂其“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sup>66</sup>皆孳乳自景祐三年既有觀點。另一方面,慶曆改革當事人確以“抑邪佞,振綱紀,扶道經世”者自居,由此引伸爲擢用范、富與否,意味善惡執政之別、正邪之爭的認識:

其一,慶曆三年仁宗手詔曰“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sup>67</sup>以天子權威肯定韓、范、富執政爲天下所望。慶曆更張主事者採“公議”說,如富弼以爲朝廷晉用韓、范,應“只從公論,不聽讒毀”;<sup>68</sup>同年歐陽修以爲擢用韓、范“萬口歡呼,皆謂陛下得人”。<sup>69</sup>皇祐四年,非慶曆之政主事人張方平(1007—1091),在祭范仲淹文中亦說慶曆五年范“時望去朝,識者曰咨”;<sup>70</sup>嘉祐元年蘇洵(1009—1066)回憶慶曆之時范、富、歐、余靖(1000—1064)、蔡襄(1012—1067)同心執政,蘇洵以“幸其道之將成”和“不幸道未成”,<sup>71</sup>來形容慶曆改革的開展與失敗。以上呈現的是若干論者認爲韓、范主持慶曆政事,意味衆望所歸的“君子”執政。

63 田況、儲玲玲整理:《儒林公議》,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冊5,頁128。

64 宋仁宗:《責范仲淹敕榜朝堂》,佚名編:《宋朝大詔令集》,卷192,《續修四庫全書》,冊456,頁619。

65 藍元震:《論范仲淹等結黨奏》,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48,頁10347。

66 脫脫等:《宋史·錢明逸傳》,卷317,頁10347。

67 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范文正公政府奏議》,卷上,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頁461。

68 富弼:《上仁宗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內外事》,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13,頁111。

69 歐陽修:《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98,頁1510。

70 張方平:《祭資政范侍郎文》,張方平著,鄭涵點校:《張方平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卷35,頁573。

71 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一書》,蘇洵著,曾棗莊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11,頁327。

其二,慶曆之政主事者論改革失敗,幾衆口一詞認為皆因“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歐陽修語),<sup>72</sup>慕私利者“廣陷良善……指爲朋黨……誣以專權”(歐陽修語),<sup>73</sup>於是“讒間得行”(富弼語),<sup>74</sup>慶曆改革者因“衆訾成波,擠落在外”(蔡襄語)。<sup>75</sup>此外韓琦論慶曆之政未竟全力,亦因“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范仲淹)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但韓琦始終認為慶曆之政“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若朝廷貫徹執行,則“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sup>76</sup>

前述無論慶曆之政主事或反對者,均罕言慶曆更張具體有哪項政策不可行,哪個主張有誤——倒是慶曆四年石介(1005—1045)作《慶曆聖德詩》,范仲淹語韓琦曰:“爲此怪鬼輩壞了也。”韓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認為《聖德詩》之失在“忠邪太明白”,<sup>77</sup>學界對此已有詳論,惟須注意以君子、小人之別比類慶曆執政者之更替,確是歐陽修等的認識,如慶曆三年,歐曰:“陛下罷去呂夷簡(979—1044)、夏竦(985—1051)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喧然,務騰讒口,以惑君聽”,以爲慶曆之世“堯臣必須大有更張”,<sup>78</sup>即以韓、范爲堯臣,與其對立者爲小人。蔡襄《乞用韓琦范仲淹奏》云“衆邪并退而衆賢并

72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21,頁335。

73 歐陽修:《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同上,卷107,頁1626。

74 富弼:《祭范文正公文》,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頁1092。

75 蔡襄:《祭范侍郎文》,蔡襄著,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卷36,頁660。

76 韓琦:《文正范公奏議集序》,韓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卷22,頁724—725。

77 范、韓之對話及“忠邪太明白”之論均見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卷1,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冊12,頁380。按:范仲淹謂石介爲“怪鬼輩”乃批評其行事方式異常,非以石介爲小人。如歐陽修《與石推官第一書》雖謂石介“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但未視石介爲小人。參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68,頁991。

78 歐陽修:《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106,頁1619。

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sup>79</sup>皇祐四年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仍以“善不勝惡”<sup>80</sup>作為慶曆之政未竟全功的主因。

歐陽修、蔡襄以君子進用，小人道消形容范、富等執政，與“慶曆之治”觀念的出現有何關係？這認識如雙面刃：一方面把慶曆改革諸臣與異見者對立起來，當代學者如方健認為范、富等終因有違仁宗崇奉的“異論相攪”祖傳統治心術，被“擠落在外”。<sup>81</sup>另一方面，富、歐、石介等的確塑造了改革諸臣擇善固執、忠梗剛直的形象。慶曆變革失敗後，其主事者忠而被謗的形象更突出，如秦觀（1049—1100）謂慶曆之時“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扼腕切齒，髮上衝冠”，<sup>82</sup>相關論調在范仲淹身故的皇祐四年尤其多見，諸如“論者漸齟齬不合，作謗害事。公知之如不聞，持之愈堅”（富弼語）、<sup>83</sup>“至死流離，惟道是賴”（蔡襄語）、<sup>84</sup>“忠臣惓惓，遠不忘國”（蘇頌代杜衍 978—1057）<sup>85</sup>等，這些評論與《楚辭》傳統中“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sup>86</sup>一樣，即通過不如意的仕宦遭遇及未竟全功之改革，反襯慶曆君子不同流合污，持志堅貞，九死未悔的形象。嘉祐以後，韓、富、歐居朝廷要津，標志著仁宗始終肯定慶曆改革者為賢臣，由此進一步推動了北宋中葉時人對“慶曆更張”即君子之政的想象。這可從以下論述得見。

治平二年（1065）程頤（1033—1107）曰：“如真廟擢种放（955？—1015），先朝用范仲淹……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sup>87</sup>程頤謂仁宗“篤信”范仲淹，不合事實，是其對先朝君賢臣忠、君臣相契的美好想象。治平中，范純

79 蔡襄：《乞用韓琦范仲淹》，蔡襄著，吳以寧點校：《蔡襄集》，卷 18，頁 334。

80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 50，頁 697。

81 方健：《范仲淹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77、283—286。

82 秦觀：《朋黨》，秦觀著，周義敢、程自信、周雷編注：《秦觀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卷 17，頁 367。

83 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誌銘》，杜大珪編：《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集卷 12，頁 4。

84 蔡襄：《祭范侍郎文》，蔡襄著，吳以寧點校：《蔡襄集》，卷 36，頁 660。

85 蘇頌：《代杜丞相祭范資政》，蘇頌著，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卷 70，頁 1062。

86 屈原：《涉江》，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130。

87 程頤：《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程頤、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5，頁 526。

仁曰：“竊以昔在治隆之世，多求諫爭之臣……仁皇嘗行此道以致太平”，<sup>88</sup>文中緊接此句舉“先臣”（即范仲淹）為例，意指仁宗擢用如其父的諫諍之臣，仁宗致治之道在於親賢。元祐元年（1086）蘇轍云：“仁宗皇帝仁厚淵嘿，不自可否……孔道輔（986—1039）、范仲淹、歐陽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風既行，士恥以鉗口失職。”<sup>89</sup>這泛指慶曆前後諸臣敢於進諫。學界已指出熙豐變法與宋仁宗形象提升的關係，<sup>90</sup>就上述材料可見，塑造仁宗為任賢納諫之明君形象，已見於英宗朝。

美化慶曆改革為“慶曆之治”的另一方式，是把慶曆改革倡議與仁宗之德政等同起來——善政勛業則歸功天子，這固沿襲先秦儒家傳統，<sup>91</sup>但以《十事疏》內容為人臣（范、富等）或人君（仁宗）之政策，仍大不相同：分別當然在於熙寧以後，宋代執政者可以批評前代官員，但幾不可能批評先帝，所以視“十事”為仁宗主見，意味慶曆改革必然正確。最具代表性也最權威的是元豐六年（1083）關於仁宗徽號的討論：王珪（1019—1085）等請上仁宗徽號，論慶曆之時仁宗“發德音，下明詔，興學校，勸農桑，修廢官，舉逸民。破拘攣之例以薦進人才，革因循之法以旌別能否。”文中“拘攣”“因循”為貶義詞，予人“更張”理所當然的印象，餘像興學校、勸農桑等都是必然正確的。同年七月王珪撰《仁宗皇帝加上徽號冊文》，又云慶曆之時“方朝廷之久安，迺大革因循，而聖政又新。”<sup>92</sup>句中用了“革”“新”二字描述慶曆更張，這個“新”字兼指慶曆之時朝廷氣象一新及政策之更變；王珪在元豐年間謳歌慶曆改革，與當時神宗親自主持變法，王珪投其所好有關，這和慶曆更張當事人未曾以“革新”指涉慶曆政事大不相同，但這說法絕不見於反對熙豐變法者。慶曆之政最為人稱頌的，是州縣立學，這同樣被視為仁宗和慶曆改革者的共同主張：即宋人如歌頌范仲淹時，

88 范純仁：《安州通判到任表》，《范忠宣公文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明修本），卷6，頁1。

89 蘇轍：《論臺諫封事留中不行狀》，蘇轍著，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樂城集》，卷36，頁623。

90 張林：《熙豐變法與宋仁宗形象的提升》，《史學集刊》2015年第3期，頁4—10。

91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齊桓修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天子。”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9，頁285。

92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2032—2033。

會說仁宗“詔天下州縣皆立學……參知政事范公仲淹請也”；<sup>93</sup>或當更強調仁宗之德時說“仁宗皇帝欲以人文陶一世，乃下書俾郡邑立學”（熙寧元年）、<sup>94</sup>“慶曆中，仁宗皇帝銳意圖治，以庠序爲教化之本，于是興崇太學，首善天下”。（紹聖元年 1094）<sup>95</sup>這當然符合以庠序之教爲治國育才之本——這不容置疑的儒家準則，使“興學”與“任賢”一樣，爲“慶曆之治”概念的兩個最重要內涵。

綜上所述，英宗朝以後論慶曆之政，更聚焦仁宗用諫諍之臣，及慶曆興學的意義，加上把改革者主張視爲仁宗主見，在“追憶”先朝盛世的想象下，終於形成“慶曆之治”概念。元符三年（1100）陳師錫（1053—1121）云仁宗“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至慶曆、嘉祐之治，爲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sup>96</sup>首見“慶曆之治”說，引文中所舉四人均參與慶曆更張，即北宋後期已有慶曆之治足可比媲美三代之見解。秦檜（1091—1155）說“復慶曆、嘉祐之治，乃國家福也”；<sup>97</sup>陳俊卿（1113—1186）曰“本朝之治惟仁宗爲最盛”，勸勉孝宗“專以仁宗爲法，而立政任人之際，必稽成憲而行，則慶曆、嘉祐之治不難致”；<sup>98</sup>蔡杭（1193—1259）曰：“我朝慶曆之初，仁祖銳意求治，登用諸賢，而韓琦、富弼、范仲淹亦皆同心體國，上前爭事而下殿不失和氣……故卒至慶曆之治”；<sup>99</sup>呂中（淳祐七年 1247 進士）曰“仁宗慶曆之治，至今景仰以爲甚盛”<sup>100</sup>——

93 陳垓：《高郵軍興化縣重建縣學記》，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附錄七，頁 1043。

94 鄭獬：《安州重修學記》，《鄖溪集》，卷 15，《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冊 1097，頁 253。

95 朱長文：《春秋通志序》，《樂圃餘藁》，卷 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冊 1119，頁 36。

96 陳師錫：《上徽宗論任賢去邪在于果斷奏》，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 17，頁 160。

97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 15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冊 327，頁 121。

98 朱熹：《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魏國公贈大師謚正獻陳公行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96，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冊 25，頁 4457。

99 蔡杭：《上殿輪對劄》，《久軒公集》，蔡有鵬輯，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卷 8，《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冊 346，頁 823—824。

100 呂中：《國勢論》，《宋大事記講義》，卷 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冊 686，頁 195。

在上述從陳師錫開始的幾條材料中，“慶曆之治”未曾讓宋人不辯自明地想到改革、新法、變法等含義，如陳師錫等說“慶曆、嘉祐之治”，嘉祐時並無變法。此外，上述材料無一關注慶曆改革的具體內容，只把慶曆之治歸因於仁宗任賢、納諫，以及忠臣同心輔政；於是“慶曆之治”的內涵，被簡化或提升為諸如“開納直言，善御群臣，賢必進，邪必退”<sup>101</sup>等必然正確的論調。紹興間，李綱（1083—1140）曰：

嘉祐間，韓琦、范仲淹、富弼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為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於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sup>102</sup>

先不管范仲淹非執政於嘉祐——李綱完全無視慶曆主事者確因“衆訾成波，擠落在外”，慶曆改革未竟全功的事實，又以韓、范等的“德業”為仁宗察小人之言的結果——若非李綱對本朝歷史認識極貧乏（這很不可能），即他應是故意建構並美化“慶曆（嘉祐）之治”，以之作為當朝天子（高宗）的榜樣。這種重塑先朝之政的策略，顯然無法揭示慶曆改革真正的內涵和特色，卻創造了仁宗、范仲淹等君臣相契的慶曆理想世界。

#### 四、關於范仲淹故後宋人對其評價問題

學界已指出慶曆時黨同伐異，非如後世想象般和而不同。<sup>103</sup> 范仲淹在世時所受批判很多，其“一代名世之臣”的形象確立於北宋末期，<sup>104</sup>後愈趨理想化，

101 陳師錫：《上徽宗論任賢去邪在于果斷奏》，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 17，頁 160。

102 李綱：《論朋黨劄子》，李綱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 年），卷 81，頁 822。

103 宮崎市定：《宋代の士風》，見氏著：《宮崎市定全集》（東京：岩波書店，1999 年），冊 11，頁 339—375。

104 遠藤隆俊：《宋代蘇州范文正公祠》，范敬中主編：《中國范仲淹研究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 年），頁 325。



成爲“士大夫精神世界的聖人”(王瑞來語)。<sup>105</sup> 朱熹曰“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sup>106</sup> 這觀點幾成南宋對范仲淹的定評。<sup>107</sup> 那在此之前,即范仲淹故後至北宋末年這段關鍵時間,北宋時人——尤其是熙豐變法主事者宋神宗、王安石對范仲淹有何評價?

今存皇祐至靖康年間文獻,有別於范仲淹忠義、賢德以外形象的記載不多,如熙寧中釋文瑩(仁宗至神宗朝時人)引范仲淹嘗謂人曰:“子野居常病羸不勝衣,及其論忠義,則龍驤虎賁之氣生焉”云云,以爲范“極端方,而笑謔有味”<sup>108</sup>——這是極少數論范仲淹說話風格的文字。神宗朝,强至(1022—1076)引韓琦語,云范仲淹任司諫時當面語丞相王曾(977—1038)曰:“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范據此批評王曾自“當國……門下未見一人”;王曾回應說:“司諫不思耶? 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恍若自失,退語公(韓琦)曰:‘真宰相器。’”<sup>109</sup>——這段文字記范仲淹偶思慮不周,不明白王曾用心良苦,但總的來說始終呈現范期望宰相任賢、范明白王曾所想後對其敬重有嘉的正面形象。元符年間蘇轍記范仲淹“早歲排呂許公(呂夷簡),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慶曆之政失敗後范再遇呂,“知事之難,惟有過悔之語,於是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sup>110</sup>這和歐陽修撰范仲淹神道碑謂慶曆以後“二公(呂、范)歡然相約戮力平賊”<sup>111</sup>的晚年關係脛合,與范純仁謂“吾翁未

105 王瑞來:《配享功臣:蓋棺未必論定——略說宋朝官方的歷史人物評價操作》,《史學集刊》2011年第5期,頁38。

106 朱熹:《朱子語類》,卷17,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冊18,頁1636。

107 劉子健指出朱熹曾15次稱頌范仲淹,James T. C. Liu, “An Early Sung Reformer: Fan ChungYen”,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11.

108 釋文瑩著,鄭世剛整理:《續湘山野錄》,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冊6,頁72。

109 强至著,黃純艶整理:《韓忠獻公遺事》,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冊8,頁19。

110 蘇轍著,孔凡禮整理:《龍川別志》,卷上,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冊9,頁327。

111 歐陽修:《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卷21,頁335。

嘗與呂公平也”<sup>112</sup>有別。<sup>113</sup>蘇轍的記載寫慶曆改革後,范對政治體會更深,對景祐時抨擊呂夷簡太甚有悔意。饒有意思的是:即使歐陽修堅持呂、范和好屬實,元祐以後宋人其實已甚少關注范仲淹罷參知政事後的想法——他們更常按“君子一小人”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塑造范仲淹在慶曆期間及被貶後“持之愈堅”(前引富弼語)的“第一品人”(黃庭堅 1045—1105)<sup>114</sup>形象,使得范仲淹的形象趨於扁平。

皇祐至元豐期間對范仲淹顯有貶評的材料極罕見,只有幾下幾項:署名梅堯臣(1002—1060)著《碧雲駢》及梅詩——宋人或以《碧雲駢》為魏泰(神宗至徽宗年間)偽作,劉子健、孫雲清已駁此說。<sup>115</sup>劉、孫及朱東潤均同意梅堯臣《靈烏後賦》批評范仲淹執政措置不當,“既不我德,又反我怒”;<sup>116</sup>但劉、孫對《碧雲駢》作者是否梅堯臣所著觀點各異:劉認為范、梅雖於慶曆年間決裂,乃因梅一時氣憤,其內心還是承認范不失為偉人;<sup>117</sup>孫雲清反對此說,認為《碧雲駢》中范仲淹形象,與范、梅二人關係變化,以及梅詩中對范的不滿脗合,沒理由認為《碧雲駢》不是梅的著作。<sup>118</sup>方健亦認為如梅堯臣《諭鳥》《日蝕》《次韻答黃介夫七十韻》等明顯反映梅對范強烈不滿,《碧雲駢》為梅撰無疑。<sup>119</sup>按:《次韻答黃介夫七十韻》寫於嘉祐三年(1058),距范卒年已六年,距梅卒年只兩

112 葉夢得著,徐時儀整理:《避暑錄話》,卷上,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冊10,頁260。

113 關於呂、范關係的研究參王瑞來:《范呂解仇公案再探討》,《歷史研究》2013年第1期,頁54—67。

114 黃庭堅:《跋范文正公詩》,黃庭堅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正集卷26,頁689。

115 劉子健:《梅堯臣〈碧雲駢〉與慶曆政爭中的士風》,見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頁103—116;孫雲清:《〈碧雲駢〉新考》,徐規主編:《宋史研究集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41—367。

116 劉、孫觀點出處同上,並參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卷15,頁323。

117 劉子健:《梅堯臣〈碧雲駢〉與慶曆政爭中的士風》,見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頁103—116。

118 孫雲清:《〈碧雲駢〉新考》,徐規主編:《宋史研究集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41—367。

119 方健:《范仲淹評傳》,頁86—97。梅堯臣:《諭鳥》《日蝕》《次韻答黃介夫七十韻》,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卷15,頁291、305;卷28,頁1018。

年,反映慶曆以後梅對范的憤恨未因范亡故淡化,梅很可能至死未能釋懷,並非“一時氣憤”。本文採孫雲清、方健觀點認為《碧》當為梅作。

就本文關注點而言,則無論梅詩或《碧雲駢》,均未具體批評慶曆改革綱領和內涵——梅刺范的詩歌篇幅不長,難像評論文章般詳論慶曆政策,但即使是筆記體的《碧雲駢》,寫的也是“范仲淹收群小,鼓扇聲勢,又籠有名者為羽翼,故虛譽日馳,而至參知政事”“收群小,籠名士”等人格批評,並譏諷范仲淹微時攀附范仲尹(景祐時任中書省吏)，“曩大有貲蓄,已為仲淹取給盡矣”,後“仲尹貧,范仲淹略不撫其家”;或謂慶曆三年仁宗“自即位,視群臣多矣,知仲淹無所有……密試以策,觀其所蘊”,“策進,果無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談耳’……因不復用”,<sup>120</sup>以刻劃范仲淹無能,為仁宗所棄的負面形象。這段話把仁宗與慶曆改革之臣(范仲淹)分別開來,則慶曆改革失敗,反而是仁宗不任碌碌無能之臣(范仲淹)的結果。文中對范的政見只以“果無所有”“老生常談”一筆帶過,仁宗譏笑范“無能”等顯屬虛構。總之,以上反映:一、梅對范的貶評始於二人交惡,在梅詩中以鳥意象書寫其怨懟之情,在筆記體文字更進一步虛構故事,醜化范為謀私結黨、無能、吝嗇之人;二、梅批評的是范本人,而不是慶曆改革;三、梅否定范的方式,仍是塑造范為小人(收群小、攀附權貴、吝嗇、不感恩圖報),這一準則和慶曆四年藍元震批評范、歐等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挾恨報仇,何施不可”<sup>121</sup>並無不同。

除梅堯臣外,景祐至元豐非因個人關係對范仲淹顯有貶評者,只有宋神宗及王安石——這對解釋他們何以從不認為“熙豐變法繼承慶曆改革”的問題,非常重要。學界對慶曆時王安石由衷肯定並期盼范等能致太平之業、皇祐元年范、王交往,以及皇祐四年王祭范文稱其為“一生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

120 梅堯臣著,儲玲玲整理:《碧雲駢》,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冊5,頁79。

121 藍元震:《論范仲淹等結黨奏》,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48,頁3582。

疵”<sup>122</sup>已有詳論。<sup>123</sup>王在范卒年，謂慶曆之政“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嗟歎范“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設想“肆其經綸，功孰與計？”<sup>124</sup>這和前引慶曆改革主事者的認識相同。高克勤認為王繼承和發展了慶曆新政的改革精神，<sup>125</sup>這從當代觀點而言足可成立，但問題是：何以在熙豐變法時期，王安石從沒這樣說？漆俠認為王既非“范仲淹集團”也非范的反對派，另劉子健、漆俠均注意到熙寧九年王批評范“廣名譽，結游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sup>126</sup>揭示王對范的態度，絕非僅如其祭范文中所言“一世之師”般美好。但學界罕言王安石這段對范的批評，是承接神宗對范的貶評而說的，須進一步討論。

嘉祐三年，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云：“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sup>127</sup>此指慶曆之政，即王安石視慶曆之政為變革。“僥倖之人不悅”和慶曆主事者說法相同，“始計利害未嘗熟”的主語是朝廷，這裏的“朝廷……遂止而不敢為”曲指范、富思慮慶曆改革尚有不周，未克其終。當然實際上范等罷政是朋黨論、進奏院事件、偽造石介書信等的結果，尚不可視為王批評范的確據，但可見王在嘉祐之時已指出慶曆變革考慮欠周詳。

熙寧五年，神宗語王安石曰：“人謂今日朝廷邊事勝慶曆中，此甚不然”，原因是“方仲淹為帥時，元昊已困”；王認同神宗之言，引伸說：“范仲淹非有過人

122 王安石：《祭范穎州文》，《臨川先生文集》，卷 85，王安石著，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2017 年），冊 7，頁 1493。

123 高克勤：《道宗當世，名重本朝——簡論范仲淹與王安石》，見氏著：《王安石與北宋文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31—142。

124 王安石：《祭范穎州文》，《臨川先生文集》，卷 85，王安石著，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冊 7，頁 1493—1494。

125 高克勤：《道宗當世，名重本朝——簡論范仲淹與王安石》，見氏著：《王安石與北宋文學研究》，頁 138。

126 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75，頁 6732。劉子健：《梅堯臣〈碧雲騷〉與慶曆政爭中的士風》，見氏著：《兩宋史研究彙編》，頁 104；漆俠：《范仲淹集團與慶曆新政——讀歐陽修〈朋黨論〉書後》，《歷史研究》1992 年第 3 期，頁 127。

127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臨川先生文集》，卷 39，王安石著，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冊 6，頁 767。

智略，粗知訓練持守，元昊已不能侵犯”，<sup>128</sup>句中描述范軍事能力平平，非有過人之處，這和北宋中葉後宋人常歌頌范仲淹才兼文武大不相同。<sup>129</sup> 在王安石說出以上觀點前，神宗尚未提及范仲淹——認為范軍士智略並不過人的觀點是王主動提出來的，接續王補上一句：“當是時惟仲淹為見稱述，即仲淹亦粗勝一時人。仲淹為帥，元昊所以不能犯者，為主客勢異，仲淹務自守故也。”“粗勝”即“稍勝”，比“一時人”好一些，但非傑出人物。再接續，神宗謂“歐陽修議狀極無理趣”，王附和神宗論水洛城事，謂尹洙（1001 或 1002—1047）“實不曉事，妄作向背而有時名……如此等人最害世事”，“（韓）琦尤嚴重洙”，神宗認同王對尹、韓的批評（“上以為然”）。<sup>130</sup> 以上可見，熙寧間神宗、王安石在同一段對話中，包含了對范、韓、歐、尹四個慶曆改革主事人或支持者的批評，絕非巧合。二人對慶曆主事者的貶評互相發揮，也彼此認同；並且，二人都未曾以“君子一小人”的二元對立模式，簡單地賅括慶曆改革者為賢臣。

《熙寧奏對日錄》中，王安石對每一位慶曆改革主事者幾乎都有批評，如說“如（歐陽）修輩，尤惡綱紀立，風俗變”、“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富弼兼此二罪”；神宗謂“韓琦用心可知，天時荐饑，乃其所願也”，王回應說：“若與之（韓琦）計國事，此所謂啓寵納侮”；<sup>131</sup>再一次，神宗、王安石對韓琦的貶評一唱一和。<sup>132</sup> 以上批評的力度甚強烈，有悖時人多以慶曆改革者為君子、賢臣的成見。這是熙寧九年，即王安石說范“非有過人智略”四年後，神宗與王安石再次批評范的背景。熙寧九年神宗、王安石論范仲淹，這段話非常重要，全錄如下：

<sup>128</sup> 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34，頁 5673。

<sup>129</sup> 如黃庭堅《跋范文正公手書道服贊》謂“范文正公當時文武第一人”，黃庭堅著，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補遺卷 9，頁 2308。

<sup>130</sup> 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34，頁 5673。

<sup>131</sup> 王安石：《熙寧奏對日錄》，王安石著，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冊 4，頁 135、116。

<sup>132</sup> 按：王安石在《忠獻韓公挽辭二首》之二中歌頌韓“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勛在鼎彝”，這和《日錄》所載對韓的評價明顯不同。同上，冊 5，頁 691。語錄及私人著作，通常較公文及頌篇更反映作者真實觀點。前述《碧雲駝》對范的批評顯較梅詩激烈，情況類似。

上又論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賦體《動靜交相養賦》爲法，假使作得《動靜交相養賦》，不知何用？且法既不善，即不獲施行，復何所憾！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此而已。

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游士，以爲黨助，甚壞風俗。”

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爲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513—581)爲文，此亦識見無以勝俗故也。無以勝俗則反畏俗，俗共稱一事爲是，而已無以揆知其爲非，則自然須從衆，若有以揆其爲非，則衆不能奪其所見矣。”<sup>133</sup>

以上對話八成(第一、三段)都是神宗觀點，可見：一、在這次神宗、王安石批評范的論述中，神宗是主導角色，王附和神宗對范的貶評，並作發揮。二、神宗先直接否定貢舉法內容，再泛論范仲淹“無學術”，則神宗否定的不止是慶曆改革個別政策，而是全面否定范的識見、能力。三、王大致同意神宗對范“學術”的批評——“多暇日”句指范不專心治學，這是王認爲范雖天資聰敏卻始終“出人不遠”的原因。四、王接續批評范結黨、好名，“甚壞風俗”的評語與前引富弼云慶曆之時范仲淹“振綱紀”南轅北轍。五、神宗同意王的觀點，再舉唐太宗事爲例，論證范“好名譽”正因識見非異於世俗，故隨波逐流，爭名結黨。

學界過去多聚焦熙寧九年王對范的批評，忽視對話中神宗才是主導角色。以上可見在熙寧間對慶曆改革主事者(范、韓、富、歐)的貶評，既是王安石的觀點，更是神宗的認識——在二人上述對話中，神宗較王對慶曆改革主事者的抨擊更廣泛、直接。今存文獻未見熙寧五年前神宗對范的批評，這或因文獻佚失，也可能是靖康以後范被視爲忠義代表，王被視爲小人，致使熙豐年間的對范的批評難以流傳——但按常情而論，神宗對范的貶評不會突如其來，較可能是他

133 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75，頁 6732。

成年後已有的成見。從熙豐年間，連一篇扣連慶曆更張及熙豐變法關係的詔令都没有的事實可推測：神宗根本不認為慶曆改革值得取法，王附和其說，在他和神宗的認識中，慶曆之政並非典範，過失頗多。熙寧時，范已非王安石充分肯定的名臣。這當然主導了熙豐時期，朝廷對慶曆改革的評價。

另一方面，熙豐年間神宗、王安石對范的貶評，未曾影響反對王安石變法者歌頌范仲淹人格及肯定慶曆之治的判斷。神宗朝後，元祐元年（1086）蘇轍說“慶曆之盛，朝多偉人。維范與富，才業名位，實相先後，海內稱誦。見於聲詩，比之夔、契。”<sup>134</sup>“惟仲淹、弼，一夔一契”本是石介《慶曆聖德詩》名句，田況《儒林公議》舉出《聖德詩》此句後云“氣類不同者惡之（石介）若仇”<sup>135</sup>——然而在石介身故（也是范仲淹罷參知政事）42年後，蘇轍再一次以范、富比夔、契，反映蘇轍堅持范、富足可比肩帝禹之賢臣的認識。同年，王巖叟（1043—1093）曰：“石介作為《聖德頌》以詠仁宗之美，天下流傳，至今稱為盛事。”<sup>136</sup>類似說法見於元祐二年蘇軾曰：“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sup>137</sup>以蘇軾的博學及其與歐陽修的關係，肯定知道《聖德詩》對慶曆改革的負面影響，這意味：在慶曆之政事過境遷後——就算連慶曆當事人（范、韓）也曾認為《聖德詩》忠邪太分明——蘇軾（以及王巖叟）還是認同石介指出了慶曆之治最關鍵的理由：即仁宗任賢。按此，石介曾經的污名幾完全洗刷。

元祐以後，對范為忠賢之臣的判斷，進一步成為朝野共識。元祐三年以哲宗名義予范純仁的批答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sup>138</sup>這段句以天子權威，肯定范仲淹名言契合聖人之道；元祐四年，蘇軾謂范“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

<sup>134</sup> 蘇轍：《富弼贈太師》，蘇轍著，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樂城集》，卷32，頁557。

<sup>135</sup> 田況、儲玲玲整理：《儒林公議》，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冊5，頁88。

<sup>136</sup> 王巖叟：《上哲宗再論安燾除命》，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卷57，頁629。

<sup>137</sup> 蘇軾：《富鄭公神道碑》，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18，頁531。

<sup>138</sup> 蘇軾：《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答》之二，同上，卷43，頁1252。

食……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sup>139</sup>以天性論演繹范仲淹好仁樂義，出於本心；即使是同年梁燾（1034—1097）《劾范純仁第二疏》謂其“妄自比其父之敢爲，可謂不忠矣”，<sup>140</sup>或紹聖四年（1097）葉濤（熙寧六年 1073 進士）《范純粹落職居住制》謂其“傾邪險詖，出於天資。反覆導諛，忘其父志”<sup>141</sup>——兩篇文章猛烈抨擊范仲淹之子狗尾續貂，但始終肯定范仲淹“敢爲”及其“志”；故范純仁、純禮（1031—1106）、純粹（1046—1117）兄弟雖名列元祐黨人碑，卻絲毫不曾動搖哲、徽宗年間范仲淹的正面形象。王得臣（1036—1116）《塵史》記寇準（961—1123）、范仲淹同爲善政，“邦人神明之”，肯定二人“生澤其民，歿列於神，可謂盛德矣”；<sup>142</sup>側寫范之功德爲上天肯定，這是神化范仲淹較早期的記載。靖康元年（1126）追封范仲淹爲魏國公，誥令曰：“危言警世，高誼薄乎天地；直道立朝，勁氣貫乎金石。人議大政，有功斯人”，<sup>143</sup>至是，宋人對范的忠義形象再無異議。

總之，梅堯臣對范的批評出於個人恩怨。與此不同，認爲慶曆改革計慮不深、范、韓、富等識見不足，好名結黨是神宗、王安石的共同立場——他們對范的批評有時候先由神宗提出（熙寧九年），有時候先由王安石提出（熙寧五年），二人互相發揮、彼此支持。當然這並不意味慶曆至皇祐間王對范的仰慕不是出於真心，但正如熙寧間王對歐陽修態度已遠不如他曾在《上歐陽永叔書》的謙恭一樣，<sup>144</sup>隨著王的歷練、對變法之方針愈有個人判斷，他已敢於在天子面前批評他曾稱爲“名節無疵”的范仲淹好名譽、甚壞風俗。熙寧元年後，王已不再提及他認同慶曆改革，可視爲他對范的評價已有改變的佐證。雖然如此，景祐以後像梅堯臣、神宗、王安石對范的貶評畢竟甚罕見，未成風尚，尤其不被反對熙豐變法者認同。

139 蘇軾：《范文正公文集敘》，卷 10，頁 312。

140 梁燾：《劾范純仁第二疏》，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28，頁 10349。

141 葉濤：《范純粹落職居住制》，佚名編：《宋朝大詔令集》，卷 208，《續修四庫全書》，冊 456，頁 676。

142 王得臣著，俞宗憲點校：《塵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卷中，頁 25。

143 汪藻：《范仲淹追封魏國公誥》，汪藻著，王智勇箋注：《靖康要錄箋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年），卷 3，頁 428。

144 王安石：《上歐陽永叔書》之二：“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 74，王安石著，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冊 6，頁 1323。並參顧永新：《歐陽修和王安石的交誼》，《文學遺產》2001 年第 5 期，頁 128—130。



此外還可見一個趨勢，景祐以後直至南宋，即使是褒揚范仲淹者，也愈來愈少提及他在慶曆時期的政見，卻更強調其作為名臣、剛梗之士的形象。舉樓鑰（1137—1213）《范文正公年譜》為例，《年譜》雖在慶曆三、四年條簡述《十事疏》內容，可是作為范仲淹一生行事書冊提綱挈領的《年譜·序》，序文遍述范家世、童年、舉進士、出仕、建義莊、個性、好施予、名言、德政、官至參知政事、謚號、著作、妻兒——而隻字不提慶曆改革。<sup>145</sup>一言蔽之：樓鑰並不認為慶曆改革之於賅括及評價范仲淹一生，有重要意義。這反映在南宋之時論者雖偶爾比較范、王改革之別，卻明顯更強調范仲淹正人君子的形象，而非其改革家身分。

## 五、范、王之比較——兼論“熙豐時期 慶曆革新派趨於保守”說

當代評論或曰熙豐時期，慶曆革新派趨於保守，這在當代話語中屬貶評，卻非宋人的理解。然則宋人以爲慶曆改革與熙豐變法有何不同？南宋以後關於范、王之比較有何特色？

熙寧六年，韓琦在《歐陽修墓誌銘》謂慶曆時范、歐等舉綱紀、絕僥倖，以助天子“整齊衆治，以完太平”；又記熙寧時歐反對青苗法，歐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sup>146</sup>引文中“守拙”爲褒義詞，如陶潛（365—427）詩“守拙歸園田”<sup>147</sup>指以拙自安，“守拙”與“新奇”相對，“循常”與“功利”對立，歐以常道爲人臣執政之圭臬，故反對標新立異求功利。韓認為這是歐在慶曆、熙寧年間始終如一的立場。

熙寧八年，李清臣（1032—1102）在韓琦行狀回顧慶曆及熙寧時韓琦政治主張，寫法與韓撰歐墓誌大同小異。《行狀》載：慶曆時仁宗諮臣以當世急務，韓琦前後獻十六事以上；熙寧推行常平法，韓亦“條上數千言”論常平法之失——

145 樓鑰：《范文正公年譜》，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頁759—761。

146 韓琦：《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陽公墓誌銘》，韓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卷50，頁1537、1551。

147 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2，頁76。

李清臣在同一篇行狀兼論慶曆、熙寧時韓琦事君盡心,以呈現韓“寧以言得罪,猶愈於老疾瀕死之年以不言負天下責”<sup>148</sup>的忠臣形象。李清臣褒揚韓的準則,不是韓支持更革與否,而是人臣能否不計算個人得失,或直言,或強諫,是是非非;李認為這是韓在北宋兩次改革時一以貫之的立場。上述歐陽修墓志銘及韓琦行狀可見:熙寧時期追述慶曆改革諸臣一生功業,均以慶曆改革為是,以熙寧變法為非;以“循常守拙”為是,以“新奇功利”為非——韓、歐按這一準則,反對熙寧變法。以上兩篇墓銘、行狀在熙寧變法如火如荼時,刻意突出韓、歐反對新法立場,尤彰顯二人能不隨波逐流、擇善固執。

上述解釋也符合熙寧間反對新法者對“改革”的看法:熙寧二年程顥(1032—1085)曰:“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以為適時因革並無不可,但須注意程顥在緊接此句後說:“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共貫哉?”<sup>149</sup>程顥認為“因革”必須符合前後聖之道。潛台詞是:若改革偏離“治之大原”則不可。熙寧三年司馬光致王安石書以為改革“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盡變舊法以為新奇”,司馬光之言是針對熙寧時“日相與變法而講利”<sup>150</sup>說的。文中以新法為新奇、講利之政,與歐陽修觀點相同。鄧小南注意到范《十事疏》自稱其主張“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sup>151</sup>按此說法,慶曆之政是遵祖宗之法“變而復常”,而非後人認為的“新政”。問題是:這綱領式——必然正確的原則性表述,有多少程度反映慶曆改革政策的具體內涵?例如說:元豐三年,曾鞏(1019—1083)論神宗改革同樣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sup>152</sup>這標準和《十事疏》“約前代帝王之道”並無不同,即使是王安石也說:“正為經術以理

148 李清臣:《韓忠獻公琦行狀》,杜大珪編:《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中集卷48,頁4、10。

149 程顥:《論十事劄子》,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頁452。

150 司馬光:《與王介甫第三書》,司馬光著,李文澤、霞紹暉校點:《司馬光集》,卷60,頁1265。

151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頁431—432。

152 曾鞏:《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曾鞏著,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30,頁442。

財爲先，故爲之（熙寧變法）。若不合經術，必不出此”；<sup>153</sup>王當然也會說“祖宗成憲”、<sup>154</sup>或代擬神宗詔云“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sup>155</sup>之類的話，但無論是熙豐時人或當代學者，都認爲慶曆、熙寧改革大不相同——換言之：純粹從曾否提出“法先王之政”口號判斷范、王改革之別，無法圓滿解釋何以宋人對慶曆、熙寧之政評價的巨大差異。

建中靖國元年（1101），即元符三年首見慶曆之治概念的翌年，曾肇（1047—1107）撰《范純仁墓誌銘》，爲解釋上述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銘曰：“公（范純仁）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人以爲有文正公之風”，和前文論皇祐四年後宋人更強調范仲淹氣節人格，而非其改革方略一樣，曾肇歸納“文正公之風”的內涵爲重名節、不計利害進退、志氣剛毅。前文云慶曆更張未竟成功，促成了范仲淹持志堅貞，不與小人同群、九死未悔的形象；那麼若“有文正公之風”的范純仁——而非王安石執政於熙豐，情況會如何？曾肇接續說：“世謂使其言行于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禍。”<sup>156</sup>再一次，曾肇和皇祐以後論者一樣，以爲只要以文正公之風（而非文正公的方略）執政，則可免綱紀紛亂、黨同伐異。嘉祐六年，蘇軾已提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sup>157</sup>曾肇則進一步把這標準套在“文正公之風”與“王安石及紹述諸臣”的對比上，這是以執政者的人格，斷定施政之善惡成敗。

南宋以後宋人對范、王的比較更趨概念化，如韓元吉（1118—1187）乾道年間以爲寇準、范仲淹“皆以參預而行大政。當是之時，人主不疑，同列不忌，終於共濟國事”，以之比對王安石、呂惠卿爭權，曰：“如安石、惠卿之爲參預則不可，如萊公、文正之爲參預，則亦何所不可哉？”<sup>158</sup>范執政時“人主不疑同列不

<sup>153</sup> 王安石：《熙寧奏對日錄》，王安石著，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冊4，頁128。

<sup>154</sup> 王安石：《乞解機務劄子》其一，同上，冊6，頁828。

<sup>155</sup> 王安石：《賜宰相曾公亮已下辭南郊賜賚不允詔》，同上，冊6，頁882。

<sup>156</sup> 曾肇：《范忠宣墓誌銘》，《曲阜集》，卷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冊1101，頁380。

<sup>157</sup> 蘇軾：《策畧三》，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8，頁232。

<sup>158</sup> 韓元吉：《上賀參政書》，《南澗甲乙稿》（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13，頁248。

忌”絕非事實，韓元吉故意淡化慶曆政事之波譎雲詭，以范的正人君子形象比對王、呂爲小人，促成了他對慶曆之治的想象。

對范、王及慶曆、熙寧改革的直接比較始於朱熹。《朱子語類》多次提及“熙寧變法”、“王介甫秉政造新法”等概念，謂王安石變法“便是慶曆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荊公所用之人，一切相反”，<sup>159</sup>又曰：“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sup>160</sup>又曰：“（熙寧）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程顥）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朱熹逕認爲變法切合北宋中葉政局，肯定慶曆改革，以其未竟全功爲恨。朱熹回答黃樵仲（1178 進士）問“塗人皆知其（王安石新法）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時說：“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狼狽。”<sup>161</sup>朱熹以爲熙變時期變法並無不妥，其失誤在於用人不善，故“變之不得其中”，<sup>162</sup>若由君子（程顥）爲之，則可變之而得其中。朱熹同樣未曾討論慶曆、熙寧變法具體政策是否得當，只以執政者之道德，論斷變法之得失。

朱熹以後，宋人大致沿襲其評價慶曆、熙寧更革的準則。如徐自明（？—1220 年後）《宰輔編年錄序》謂“觀慶曆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荊舒之學在所懲。”<sup>163</sup>潛說友（1216—1277）說“天章一疏，實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盡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之與京矣”，<sup>164</sup>呂中（1247 進士）說：“范文正之於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豐、元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sup>165</sup>

159 朱熹：《朱子語類》，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卷 128，頁 4001；卷 134，頁 4177；卷 71，頁 2401。

160 朱熹：《讀兩陳諫議遺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0，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冊 23，頁 3381。

161 朱熹：《朱子語類》，卷 130，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冊 18，頁 4035。

162 同上，卷 128，頁 4001。

163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序》，《宋宰輔編年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冊 596，頁 6。

164 潛說友：《吳郡新建范文正公專祠奉安日太守潛公講義》，錢穀編：《吳都文粹續集》，卷 1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冊 1385，頁 323。

165 呂中：《治體論》，呂中：《宋大事記講義》，卷 1，頁 190。

潛說友和呂中之言，與曾肇設想若范純仁執政於熙豐，必不至於紛更、紹述之禍如出一轍，即強調君子執政，才是革弊復常的關鍵，其內在邏輯是：一、更張的目的是救弊使復天下之理；二、復天下之理的方法是“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思變通之道；三、能以變通之道復先王祖宗之政者，只有大公無私的君子（范仲淹），因為只有文質彬彬的君子，才能行仁政；反之，小人（王安石）是君子的對立面，無論其政策如何，必然有悖於先王、祖宗之道。

換句話說：范仲淹因被視為開有宋忠義之風的君子，他主持慶曆改革，象徵賢人執政，撥亂反正，故為慶曆之治；王安石變法不是因為未曾提出“法先王”而被抨擊，而是因為他擯斥元老、講圖利之政，已被視為小人，熙寧變法——無論其內容政策如何——也必然被否定。范被視為君子是因，由此促成慶曆之治的想象是果；王被視為小人是因，由小人主持的熙寧變法必然被視為有違先王之道、祖宗之法是果。

以上也有助解釋何以皇祐以後，宋人甚少討論慶曆改革的具體內容，卻同時猛烈抨擊王安石的人格及熙寧新法政策。原因是成就范“第一品人”形象的，根本不是他的方略如何出色，而是他先憂後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人格追求。與此不同，對王的批評，除了如《辨姦論》般調其不近人情（人格批評）外，<sup>166</sup>指出熙寧變法如何圖利（政策批評），也是塑造王安石小人形象的重要論據，故宋人（尤其是南宋後）多兼論王安石人格及政策之失。南宋若干論者如王十朋（1112—1171），直接說仁宗時杜、韓、范、富等乃“相與守我宋之家法者也”，<sup>167</sup>進一步確立了慶曆之治與趙宋祖宗之法水乳交融的觀點。<sup>168</sup>宋代以後，常見如蔡世遠（1682—1733）曰“范公所立法，皆為天下人心風俗起見，養才黜奸，心事如白日青天。荊公所立法，多為謀利富國起見，徧迫而用小人附己者。

<sup>166</sup> 蘇洵：《辨姦論》，蘇洵著，曾棗莊箋注：《嘉祐集箋注》，卷9，頁272。

<sup>167</sup> 王十朋：《廷試策》，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紀念館修訂：《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文集卷1，頁578。

<sup>168</sup> 前述方健認為慶曆改革因有違“異論相攪”祖傳心術致敗，“慶曆之治與趙宋祖宗之法水乳交融”或不符合事實；但這個認識，卻常見於南宋時人對仁宗朝政事的追述與想象。

此其所以大不同也”<sup>169</sup>之說，這等論調，均孳乳自南宋以來，以范、王人品論其政事得失的評價準則。

上述討論也有助回答“熙豐時期慶曆革新派是否趨於保守”的問題——其一，若以“保守”為“因循”，答案是否定的，范、歐並不認為自己及慶曆主事者墨守成規，他們堅持的不是“因循”，而是“循常”，即循常道，按“天下之理”而變通；歐陽修反對的不是變，而是有違聖王之道、祖宗之法的以奇為變、功利之變。其二，若以“保守”為“保守祖宗之法”，則韓、富、歐自慶曆執政以迄熙寧，這立場從無改變。他們一直都保守，講圖舊之新政，以復先王之道，所以沒有在熙豐時變得更守舊。其三，若以“保守”為不敢直言強諫，這更不合事實，觀乎熙豐時韓、富、歐在垂暮之年堅持論斷時政之失，即使在熙寧二年因反對變法求退的富弼，仍持續抨擊新法（如熙寧九年《論時政疏》），未曾明哲保身。總之，“熙豐時期慶曆革新派趨於保守”雖為當代說法，但非宋人主流意見，更非慶曆當事人自我認知。

## 六、結 語

宋人為甚麼從不說慶曆新政、慶曆新法、慶曆變法？或者說：何以用這些概念賅括慶曆改革，對絕大多數慶曆以後宋人來說是不貼切的？簡言之：無論是慶曆之政主事或反對者，均從未認為慶曆改革悖於先王之道、祖宗之法；范仲淹按其對《易》變通之道的理解，以“適道者與權”<sup>170</sup>為原則，藉權變更張，以救日削月侵的綱紀制度和道德人心——這個理念，其正確性毋庸置疑。正因如此，即使是欲一網打盡慶曆改革主事者的夏竦、王拱臣（1012—1085），也只能以結黨之罪名及謠言，逼使范、富等避嫌去職。不難想象，若慶曆改革予人有絲毫或違祖宗之法的把柄，反對慶曆改革者不可能不作猛烈抨擊。

熙豐年間，神宗、王安石認為范識見不足，慶曆更張不足取法，是他們不曾

169 蔡世遠書王安石《祭范潁州文》後，蔡世遠：《古文雅正》，卷1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冊1476，頁199。

170 范仲淹：《明堂賦》，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卷1，頁5。

聯繫慶曆、熙豐改革相承關係的理由；至於像韓、歐、富、司馬光、范純仁、二蘇等，則認為熙寧變法以新奇為尚、謀功利之事，與慶曆改革“約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的方針背道而馳，亦罕言二者有何聯繫。北宋後期，隨着“新法”“變法”“新政”每使人聯想到王安石改革，宋人更不會以這些概念，指向象徵君子之政的慶曆之治。南宋以後，關於范、王的比較，多聚焦二人正邪之別，雖偶爾提及二人均主持改革，但除興學一項外，已鮮少提及慶曆更張的具體內容——原因是如何改革並非宋人想象慶曆之治的重點。

從觀念史言之，則還可看到：即使從當代視角顯而易見北宋兩次變法頗具可比性，然而在宋代語境，慶曆之治（象徵君臣相契、賢人執政）與熙寧變法（小人禍國、與民爭利之政策）卻非同一層面的概念。惟有逾越“賢臣即善政”的思維定勢，才可能在人格批評的準則以外，對慶曆改革提出新見。這卻需待數百年後，王夫之（1619—1692）《宋論》而後始，曰：“若其（范仲淹）執國柄以總庶務，則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而亟議更張……乃使百年安靜之天下，人挾懷來以求試，熙、豐、紹聖之紛紜，皆自此而啓，曾不如行邊靜鎮之賴以安也……希文之過，不可辭矣。”<sup>171</sup>這段話肯定范仲淹好善惡惡，卻以為慶曆更張變改北宋中葉風氣。“希文之過”不是由於范的道德有何缺失，只因他的改革下啓北宋中後期紛擾之政局，已罪不可辭。

1908年，梁啟超（1873—1926）以其改革家身分著《王荊公》以為仁宗時“能知治體有改絃更張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論其志畧，尚下荊公數等”，<sup>172</sup>這仿如神宗、王安石之論調，再次從識見評價范、王高下。1940年，錢穆《國史大綱》首立“慶曆熙寧之變法”分節，自始關於北宋兩次變法的比較如雨後春筍，20世紀50年代慶曆新政概念出現後，學界更關注討論兩次變法的新猷，“慶曆新政”旋即成為學界（尤其是大陸學界）常用語，“慶曆之治”說則湮沒無聞。

總之，今人以“新政”“新法”指涉慶曆更張，確可迅速指向慶曆年間范仲淹等主導的改革，本文認為毋須也不應強求學者改用范、歐等當事人用語。惟須注意視慶曆改革為“新政”，非宋人觀點。當然更重要的，是通過本文論題詞彙

171 王夫之著，舒士彥點校：《宋論》（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4，頁96、99。

172 梁啟超：《王荊公》（上海：廣智書局，1908年），頁18—19。

切入,能引伸關於宋人對“更張”與“新政”、“新法”觀念的理解,這對於深化宋代政治話語、政制變革、祖宗之法等關係的討論都有助益。<sup>173</sup>

(作者: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副教授)

---

<sup>173</sup> 限於篇幅,關於元祐以後宋人對慶曆之政的詮釋如何影響宋代思想政制發展,將另文再述。



## 引用書目

### 一、中文

#### (一) 專書

方健：《范仲淹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王十朋著，梅溪集重刊委員會編，王十朋紀念館修訂：《王十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王夫之著，舒士彥點校：《宋論》。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王安石：《熙寧奏對日錄》，王安石著，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冊4。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2017年。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王安石著，王水照主編：《王安石全集》，冊5—7。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2017年。

王得臣著，俞宗憲點校：《塵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司馬光著，李文澤、霞紹暉校點：《司馬光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4年。

司馬光著，鄧廣銘、張希清點校：《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左丘明傳，杜預注，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田況著，儲玲玲整理：《儒林公議》，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冊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朱長文：《樂圃餘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冊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

朱熹：《朱子語類》，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冊14—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冊20—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2003年。

佚名編:《宋朝大詔令集》,《續修四庫全書》,冊4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呂中:《宋大事記講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呂祖謙編:《皇朝文鑑》。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麻沙劉將仕宅刻本。

杜大珪編:《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明遞修本。

林表民:《赤誠集》,明弘治十年謝鐸刻本。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25—3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李建英:《宋代士人心態與文學》。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9年。

李綱著,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長沙:岳麓書社,2004年。

李燾編著,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汪藻著,王智勇箋注:《靖康要錄箋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上海聯合發行所,1949年。

范仲淹著,李勇先、劉琳、王蓉貴點校:《范仲淹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

范祖禹:《范太史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范純仁:《范忠宣公文集》。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元刻明修本。

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5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

秦觀著,周義敢、程自信、周雷編注:《秦觀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高克勤:《王安石與北宋文學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

張方平著,鄭涵點校:《張方平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梁啟超:《王荊公》。上海:廣智書局,1908年。

梅堯臣著,朱東潤編年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梅堯臣著,儲玲玲整理:《碧雲暇》,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冊5。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畢仲游:《西臺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陶潛著,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强至著,黄純艷整理:《韓忠獻公遺事》,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冊8。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曾肇:《曲阜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10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曾鞏著,陳杏珍、晁繼周點校:《曾鞏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馮志弘:《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馮志弘:《想象的世界:唐宋觀念與思想》。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2年。

黃庭堅著,劉琳、李勇先、王荅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葉夢得著,徐時儀整理:《避暑錄話》,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2編,冊10。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

鄒智:《立齋遺文》,明天啓刻本。

趙汝愚編,北京大學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校點整理:《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劉攽:《彭城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蔡世遠:《古文雅正》,《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47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蔡杭:《久軒公集》,蔡有鵬輯,蔡重增輯:《蔡氏九儒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冊346。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

蔡襄著,吳以寧點校:《蔡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鄭獬:《鄭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0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錢穀編:《吳都文粹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85—138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錢穆:《國史大綱》。上海:國立編譯館,1940年。

霍松林:《歷代好詩詮評》,霍松林編選:《霍松林選集》,冊10。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韓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箋注:《安陽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蘇洵著,曾棗莊箋注:《嘉祐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蘇頌著,王同策等點校:《蘇魏公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蘇轍著,孔凡禮整理:《龍川別志》,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冊9。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蘇轍著,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釋文瑩著,鄭世剛整理:《續湘山野錄》,朱易安等主編:《全宋筆記》第1編,冊6。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 (二) 論文

王瑞來:《范吕解仇公案再探討》,《歷史研究》2013年第1期,頁54—67。

王瑞來:《配享功臣:蓋棺未必論定——略說宋朝官方的歷史人物評價操作》,《史學集刊》2011年第5期,頁31—41。

朱瑞熙:《范仲淹“慶曆新政”行廢考實》,《學術月刊》1990年第2期,頁50—55。

孫雲清:《〈碧雲駢〉新考》,徐規主編:《宋史研究集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341—367。

高欣:《北宋變法的開端——慶曆新政》,《史學月刊》1959年第5期,頁14—17。

張呈忠:《變法·更化·變質——試論北宋晚期歷史敘事三部曲的形成》,《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5期,頁49—57。

張林:《熙豐變法與宋仁宗形象的提升》,《史學集刊》2015年第3期,頁4—10。

曹家齊:《“嘉祐之治”問題探論》,《學術月刊》2004年第9期,頁60—66。

曹家齊:《趙宋當朝盛世說之造就及其影響——宋朝“祖宗家法”與“嘉祐之治”新論》,《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4期,頁69—89。

漆俠:《范仲淹集團與慶曆新政——讀歐陽修〈朋黨論〉書後》,《歷史研究》1992年第3期,頁126—140。

蒙文通:《北宋變法論稿》,《古史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頁402—473。

遠藤隆俊:《宋代蘇州范文正公祠》,范敬中主編:《中國范仲淹研究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年,頁323—332。

劉子健:《梅堯臣〈碧雲駢〉與慶曆政爭中的士風》,《兩宋史研究彙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年,頁103—116。

顧永新:《歐陽修和王安石的交誼》,《文學遺產》2001年第5期,頁128—130。

## 二、日文

### 論文

國方久史:《范仲淹の慶曆改革について》,《吉備國際大學社会学部研究紀要》2001年第11

期,頁 67—76。

宮崎市定:《宋代の士風》,《宮崎市定全集》,冊 11。東京:岩波書店,1999 年,頁 339—375。

熊本崇:《宋仁宗立太子前後——慶曆“改革”前史》,《集刊東洋學》1998 年第 79 期,頁 44—69。

### 三、英文

#### (一) 專書

James T. C. Liu, *Reform in Sung China: Wang An-shih (1021 –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eter K.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二) 論文

James T. C. Liu, “An Early Sung Reformer: Fan ChungYen,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05 – 131.

Paul Jakov Smith, “A Crisis in the Literati State: The Sino-Tangut War and the Qingli-era Reforms of Fan Zhongyan, 1040 – 1045”,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5 (2015), pp. 59 – 137.

# **An Examination of Why Song People Never Spoke of the “New Policy,” “New Laws,” and “Reform of Laws” of the Qingli Era: A Case Study of History of Ideas**

**Fung Chi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When Song-Dynasty people summarize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Xining (1068 – 1077) and Yuanfeng (1078 – 1085) eras, they used the terms “new laws,” “reform of laws,” and “new policies,” but the Qingli era (1041 – 1048) was never treated in the same way. The term “New Policies of the Qingli era” is commonly used in contemporary scholarship of Chinese history, but this term was not in existence in the literature before the Qing Dynasty. What is the reason for these phenomena? The present study analyzes Song people’s writing on Qingli and makes the following arguments:

(1) During the Xining – Yuanfeng reform, Song people had never directly compared the reformist advocacy of Fan Zhongyan (989 – 1052) and that of Wang Anshi (1021 – 1086), nor had they ever considered the Qingli and Xining – Yuanfeng reforms comparable, until Zhu Xi (1130 – 1200) made such a comparison. Today’s view that the Qingli reform advocacy was deemed conservative during the Xining – Yuanfeng reform movement was never so perceived by Song people. (2) After Fan’s death, he was explicitly criticized by Mei Yaochen (1002 – 1060), Emperor Shenzong of the Song (r. 1067 – 1085), and Wang Anshi only. The criticisms by the latter two indicate that the Xining –

Yuanfeng reform leaders did not completely agree with the Qingli reform. (3) Ouyang Xiu (1007 – 1072) and the other leaders of the Qingli reform held that Fan's failure was due to the extensive wave of criticisms the reform had triggered. However,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Huizong (r. 1100 – 1126), a positive view emerged, coming with it inarguable narratives that describe the reform as a sign of Emperor Renzong's (r. 1022 – 1063) willingness to accept advice. Unable to reveal the Qingli reform's true features, this opinion deliberately ignores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the Qingli advocates were lambasted and thus demoted, but helps construct Fan's personal image as a most loyal person. (4) Song people had never considered that the Qingli reform violated the ancestral custom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is is the very reason why they had never referred to it as “new policies.” This argument was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opinion of Southern Song critics, who viewed Fan as a protector of the traditional norms laid down by the ancestors of the Song Dynasty's royal house.

**Keywords:** Fan Zhongyan, Qingli New Policies, Xining Reform, Wang Anshi, History of Ideas